

我国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对城镇体系的影响

许学强

叶嘉安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香港大学)

张 蓉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自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出口贸易与利用外资迅速扩展的情况。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区位条件的差异,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城镇体系的变化,加速沿海原有新城镇群的发展,新城镇群的形成,但由此也带来了沿海城镇的外来暂住人口大量增加、交通拥挤、土地利用难以控制以及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城镇之间的竞争多于协调,对城镇体系的发展不利。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城镇体系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分 类 (中图法) F119.9 (科图法) 57.〔.17〕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1978--199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3%,居于亚洲和世界最高之列。如此高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改革和经济的全球化而取得的。经济的全球化是1978年实行的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由于区位优势,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肯定比内陆省份快,沿海城市也比非沿海城市发展更快。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空间结构和城镇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宏观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城镇体系的影响。

1 开放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全球化

1978年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使我国向世界经济开放,尤其是向亚洲开放。因此,在旅游业、进口、出口、外国投资方面都有明显的增长。非华人旅游者从1980年底的50万增加到1990年的174万(增长230%),主要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华人旅游者同期从517万增加到2571万(增长397%)。1978年以前,贸易额总的来说是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间更是如此。1978年以后,贸易额大幅增加,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国投资给予同样重视,并已开始进行法制与行政改革,以吸引外资。

1.1 贸易

1978 年以前,我国经济以自力更生为主,对外贸易并不重要。1950—1974 年,年均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 4%。在开放政策实施后,这一比重已显著上升,达到 10% 以上,1992 年达 38%。1965—1980 年,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5.5%、进口是 8%;1980—1985 年间,分别提高到 8.6%和 17.6%;1985—1992 年,分别为 17.6%和 9.7%,1989 年以后,由于出口增长更快,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为顺差。

随着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增加,我国的贸易伙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 1)。与亚洲国家地区,特别是与日本和香港的贸易极其重要。1992 年,香港和日本占了总出口的 57.9%,但只占总进口的 42.4%。与亚洲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具有不同的意义。

表 1 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92 年)(单位:百万美元)

Tab. 1 Major foreign trade partners of China

出 口				进 口			
名次	国家或地区	金 额	百分比	名次	国家或地区	金 额	百分比
1	香 港	37 512	44.2	1	香 港	20 534	25.5
2	日 本	11 679	13.7	2	日 本	13 682	17.0
3	美 国	8 594	10.1	3	美 国	8 901	11.0
4	德 国	2 418	2.9	4	台 湾	5 866	7.3
5	韩 国	2 105	2.8	5	德 国	4 015	5.0
6	俄罗斯	2 336	2.8	6	俄罗斯	3 526	4.4
7	新加坡	2 031	2.4	7	韩 国	2 623	3.2
8	荷 兰	1 200	1.4	8	加 拿 大	1 927	2.4
9	意大利	1 095	1.3	9	意 大 利	1 748	2.2
10	英 国	923	1.1	10	澳大利亚	1 671	2.0
前 10 位合计		70 223	82.7	前 10 位合计		64 493	80.0
总出口值		84 940	100.0	总进口值		80 585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93》

大陆与香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贸易关系,贸易顺差巨大。1992 年,顺差是 170 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抵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逆差。相当部分出口到香港的商品很可能是由香港进口的,在大陆加工后,再出口到香港。作为进出大陆商品的中转站,香港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多年来,香港从大陆进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是为再出口,但在 80 年代中,上升到一半。除了提供货物中转服务,香港有效的银行系统可处理大陆与其间接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

我国正迅速发展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 1978 年的 4.6% 提高到 1992 年的 19.5%。出口为我国创造了 80% 以上的外汇收入,旅游业、劳务输出和侨汇只占 20%。不仅出口值有明显的增加,而且结构也有变化。在过去,大多数的出口产品是食物,但工业产品日益增多,初级产品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由 1980 年的 50.3% 下降到 1992 年的 20.1%,工业制品则由 49.7% 提高到 79.9%。

出口的来源地分布是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1990 年，沿海省份提供了出口总值的 71.9%。大多数的出口值一直是由重要工业基地天津、辽宁和上海以及农业和轻工业基础较好的广东和江苏等省市创造。

1.2 外国投资

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诱因之一，也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外国投资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提高了我国的管理、生产、竞争水平，从而可以赚取更多的外汇，并增加就业。外资也有助于建立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自从 1978 年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外资开始被限制在四个经济特区，后来扩展到其他指定地区，例如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产业来说，首先只允许外资投向制造业与第一产业，后来扩宽到第三产业，如零售业和银行业。外国投资主要有合资经营、外商独资、合作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等几种类型。

各种各样的投资和合作方式表明我国希望尽可能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1979—1989 年间，利用外资已达 576.24 亿美元（表 2），其中 68.2% 是对外借款，26.9% 是外国直接投资，4.9% 是其他形式的外国投资，如补偿贸易。外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占了对外借款的大部分，外国政府的贷款居第二位。合资与合作经营方式在外国直接投资中居主导地位，占了总数的 77.9%。

表 2 1979—1989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Tab. 2 Actual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between 1979 and 1989

外资类别	金 额	占每类%	占总计%
对外借款			
1. 外国政府贷款	8 370.7	21.3	
2.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6 059.7	15.1	
3. 出口信贷	2 940.9	7.5	
4. 外国商业银行贷款	16 987.9	43.2	
5. 其它	4 962.5	12.6	
小 计	39 321.7	100.0	68.2
外商直接投资			
1. 合资经营企业	7 510.7	47.2	
2. 合作经营企业	4 751.0	39.7	
3. 外商独资企业	749.4	4.8	
4. 合作开发	2 679.6	17.3	
小 计	15 493.7	100.0	26.9
外商其它投资			
1. 补偿贸易	1 687.3	60.1	
2. 其它	1 121.5	39.9	
小 计	2 808.8	100.0	4.9
总 计	57 624.2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1990》

1979—1990 年期间,最普遍的外商投资方式是合资经营,其次是合作经营,合作开发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外商独资企业相对较少。补偿贸易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吸引力,但并没有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原因,一是在产品买回方面难以达成协议,二是由于国际市场上价格和质量的竞争非常激烈,某些产品并不容易销售。

对外借款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相对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表 3)。1992 年,日本和世界银行占了对外借款的 44.6%,而 2/3 以上的外资来自香港。所以,外资很大部分来自亚洲、金融机构和政府,来自跨国公司的投资只是在近海石油开发方面比较明显。亚洲的投资主要是日本和香港,前者主要是对外借款的形式,后者则以直接投资为主。

表 3 1992 年在我国投资额最大的 10 个国家(地区或机构)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Tab. 3 The top 10 investment countries (regions or institutions) in China, 1992

名 称	合 计		其中: 对外借款		外商直接投资	
	金 额	百分比	金 额	百分比	金 额	百分比
香港	841 653	43.8	71 041	9.0	750 707	68.2
日本	317 994	16.6	243 167	30.7	70 983	6.5
世界银行	109 704	5.7	109 704	13.9	0.0	0.0
法国	77 696	4.0	73 004	9.3	4 493	0.4
美国	58 114	3.0	6 170	0.8	51 105	4.6
加拿大	27 496	1.5	21 589	2.7	5 824	0.5
意大利	26 743	1.4	24 077	3.0	2 069	0.2
德国	25 665	1.3	16 537	2.1	8 857	0.8
英国	21 553	1.1	17 703	2.2	3 833	0.4
亚洲开发银行	18 775	1.0	18 775	2.4	0.0	0.0
上述小计	1 525 393	79.4	601 767	76.1	897 871	81.6
总 计	1 920 233	100.0	791 071	100.0	1 100 751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93》

2 外国投资的空间分布

1978 年以来,我国除了进行法律和政治改革,以方便外国投资外,还指定许多地区作为吸收外资的重点地区。为外资而设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区的政策无可厚非,因为对外资来说,他们比内陆城市和地区有着更好的可达性;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也是以前外国人居住和与我国进行贸易的港口。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指定几个发展地区未免太过简单化,以至不能看到普遍的发展,但这样做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此将分析一下被指定吸收外资的三类主要地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三角洲开放地区。

2.1 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最早被指定为吸收外资的地区。最初在 1979 年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1988 年 4 月海南岛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在某些方面类似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加工区——通过提供法律和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推行出口

导向型的工业战略。我国的经济特区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相似的金融、法律、基础设施的优惠条件，包括免税、利润汇出的方便以及配套服务和厂房齐全的场所。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特区有丰富的劳动力，特别重要的是在投资、海关和入境方面简化了审批程序。

我国的经济特区是一种特别的出口加工区。制成品出口赚取外汇是经济特区的最初目的，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经济的试验室，在那里可以看到并推行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技巧，尽管是有选择地进行。经济特区的成功是辩证的，如，这些地区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比出口海外要多；有时，这些地区得到了新技术，但不是最新的；而且，据估计40%的外国投资不是投向制造业，而是旅游业或商业。

不管怎么说，经济特区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体，已发展了综合性的经济，包括庞大的零售、商业和旅游及制造业。

2.2 沿海开放城市

尽管在1984—1985年期间有一些批评，经济特区仍被看作是我国其他城市发展的典范。1984年春天，14个沿海城市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这些开放城市有与经济特区相似的优惠条件，但中央政府没有给予同样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城市又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来吸引外资。1985年6月，为了使外资投向更加集中，宣布外资主要被引入4个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而不是所有的14个城市。这4个城市将先于其他10个城市发展，后者仍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有4个主要城市一样的发展速度。但其他城市仍采取许多措施，一如既往地促进其城市的开放。

2.3 三角洲区域

一些地域较广的地区由于其可达性及其他原因，也有利于吸引外资。这一般发生在经济特区或港口城市的周围地区。1985年，设立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中心是上海）、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以广州为中心）和闽南三角洲（围绕厦门）三个经济开放区。一般认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发达和三级教育机构较完善，因此指定为开放地区似乎有利于把开放利益从经济特区或沿海城市扩散到周围地区。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首先发展沿海省份，然后发展内陆省份。随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成功，现在倾向于发展主要内河港口，如武汉；在边境也建立了特殊开发区，象联合国开发署（UNDP）资助的中朝俄三国边界地区的图们江开发。从而，逐步实现全方位开放。

尽管外国人目前能在我国的大多数省份投资，但外资仍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等沿海地区。这是因为，这样可能使积聚经济发挥作用；涉外的社会政治控制可能更容易做到；以及这些地区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外界有更好的联系，与香港和东南亚华人有更密切的关系。

因此，投资的空间分布是十分不平衡的，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尤其是象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及邻近地区和深圳、厦门经济特区。虽然趋势表明外资在逐步向内陆省份扩展，但外资对内陆省份的影响至今仍是相当小的。

港澳公司的投资集中在经济特区和邻近的粤闽两省，这很大程度上与地理条件相似和人文联系有关，它们对外商投资的区位决策起着重要作用。来自东南亚的投资者主要是海外华

人, 主要投资于广东和福建, 而且特别感兴趣在其家乡或祖居地投资。这些投资对经济特区和粤闽的小城镇十分重要, 对珠江三角洲尤其是这样。相比之下, 50%的北美和欧洲投资位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大城市, 如北京、天津和上海。

与此相应的是, 出口的来源也高度集中在工业化水平已相当高的沿海地区, 特别是主要城市中心。这些地区接受了更多的来自西方的东西, 并提供更多在外资企业工作、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近年以来, 迁移政策已较宽松, 但内地人仍不能轻易地迁到沿海省份, 以分享上述好处。这将有可能扩大沿海和内地的区域差异, 而且沿海大城市的继续城市化和增长将不可避免, 进一步促进东部沿海板块发展的积聚过程。

3 全球化对我国城镇体系的影响

开放政策已导致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由此得益更多, 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外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 相当部分的外资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等城市(表4、表5、表6)。由此扭转了过去强调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城市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然而, 根据变分系数, 不同区域和不同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巨大。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 对于大多数的地区和城市规模来说, 方差系数高达300%以上; 对大中小城市来说, 外商投资的差异极大。但是, 特大城市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表明大多数特大城市都能吸引较多的外商投资。外资的高度集中在表5中可以显示出来, 1990

表4 按城市规模和区域分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规模(1988, 1990年)

Tab. 4 The averag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er city by city size and region in China 1988, 1990

城市规模	年 份	外商直接投资平均规模(千美元)			
		西部区域	中部区域	东部沿海区域	总计
小城市	1988	81	88	1 785	776
	1990	5	140	3 531	1 756
	两年之差	-79	52	1 746	980
中等城市	1988	8	1606	10 347	608
	1990	286	600	13 871	7 700
	两年之差	278	-1006	3 524	7 092
大城市	1988	0	122	4 966	3 666
	1990	0	2 424	10 058	7 790
	两年之差	0	2 302	5 092	4 124
特大城市	1988	11 973	3 386	38 268	26 405
	1990	3 879	4 416	44 370	28 782
	两年之差	-8 094	1 030	6 102	2 377
总计	1988	852	587	7 588	3 965
	1990	347	512	10 364	5 289
	两年之差	-505	-75	2 776	1 324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资料》1989年和1991年

表 5 按区域和城市规模分的外商在城市直接投资（1990 年）

Tab. 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city size and region in Chinnese cities, 1990

区域	总金额 (千美元)	占总计 (%)	平均规模 (千美元)	标准差 (千美元)	变分系数 (%)	城市数量 (个)
区 域						
东 部	2 362 930	95.7	10 363	34 982	337.6	228
中 部	74 780	3.0	512	1 608	314.1	146
西 部	32 350	1.3	347	1 291	372.0	93
城市规模						
小城市	458 750	18.6	1 576	9 762	619.4	291
中等城市	900 930	36.5	7 700	35 589	462.2	117
大城市	218 120	8.8	7 790	19 073	244.8	28
特大城市	892 260	36.1	28 782	52 735	183.2	31
总 计	2 470 060	100.0	5 289	24 937	471.5	467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资料》1991 年

表 6 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 20 个城市（1990 年）

Tab. 6 The top 20 citie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1990

城市	所属省份	城市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 (千美元)	城市	所属省份	城市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 (千美元)
深圳	广东	中等	349 200	海口	海南	中等	73 880
大连	辽宁	特大	200 750	厦门	福建	中等	72 730
上海	上海	特大	177 190	福州	福建	大	65 100
惠州	广东	小	146 230	珠海	广东	小	62 190
广州	广东	特大	117 010	南京	江苏	特大	57 350
北京	北京	特大	105 760	中山	广东	中等	53 280
东莞	广东	中等	100 100	青岛	山东	特大	30 960
天津	天津	特大	83 150	江门	广东	中等	28 340
汕头	广东	大	81 970	沈阳	辽宁	特大	27 470
佛山	广东	中等	79 230	莆田	福建	小	22 720
合计			1 934 610				
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			78.32%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资料》1991 年

年，外资最多的 20 个城市占了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 78.3%，而这些城市全部为东部沿海城市，大多数位于临近香港——我国外资的主要来源——的广东省。

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不同。以深圳和上海为例，深圳的投资来源主要是亚洲国家（地区），尤其是香港；而在上海，亚洲显得不那么重要（表 7）。1985—1989 年期间，深圳 93.0% 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亚洲，来自香港就占了 85.0%；同期，上海只有 52.7% 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来自亚洲，亚洲以外占了 30.5%，香港虽然是最大的投资者，但只占总数

的 34.7%。在上海,日本和美国的投资比在深圳更重要。外商投资的形式也不同,深圳大多数外商投资工业项目,规模较小,而上海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大,这主要是因为来自香港的外资多少所造成的。香港的投资主要与香港的小型工业项目向外搬迁有关,投资者的资本较小,主要是利用深圳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

表 7 深圳和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和行业分布 1985—1989 年

Tab. 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source places
and industrie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between 1985 and 1989

国家(地区)	深圳	上海	行业	深圳	上海
香港	85.0%	34.7%	农业	0.5%	0.3%
日本	5.6	12.6	工业	75.3	44.2
新加坡	1.2	5.4	地质勘探	0.0	0.0
上述合计	91.8	52.7	建筑业	2.9	0.7
美国	6.0%	23.7%	交通邮电	3.5	0.4
加拿大	0.3	2.5	商业	3.7	0.5
英国	0.1	2.4	房地产	12.4	52.0
德国	0.2	1.6	卫生体育	0.1	0.0
上述合计	6.6	30.2	教育文化	0.1	0.0
其它国家	6.6%	17.1%	科学研究	0.0	0.0
总计	100.0%	100.0%	金融保险业	0.0	0.0
总额(千美元)	1 332.3	1 328.2	政府机构	0.0	0.0
占全国的%	10.2	10.2	其它	1.5	8.3
			合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对上述两个城市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也不同。1985—1989 年间,深圳 75% 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方面,而在上海,工业只占 44.2% (表 7),更多的是直接投资在房地产业。

外商投资的不同来源对城镇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大多位于南部省份,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并日益增多定位于乡镇,对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相比之下,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大多数是在城市,较少分布在农村地区。不过,由于出口工业的发展,许多城镇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经济的全球化巩固发展了业已形成的城镇群,促使新的城镇群正不断出现。形成的较早城镇群主要是:

第一,辽东半岛(沈阳—大连),以沈阳和鞍山为中心。沈阳为北界,大连为南界,前者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后者是重要港口。这一区域的城市还包括鞍山、抚顺、本溪和辽阳。城市之间以铁路和高速公路相连,均以重工业为主导。

第二,北京—天津—唐山,中心在北京。北京和天津是这一城市群的主导城市,其他城市是塘沽和唐山,其间以京沈铁路相连。

第三,长江三角洲(南京—上海—杭州),上海是中心。主导城市是上海,南京和杭州为辅助城市,另外还有无锡、苏州、常州、宁波和南通等城市。宁—沪—杭铁路、大运河和长

江是该区的主要交通网络。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城市群将得到更好发展。

第四，珠江三角洲，以香港和广州为中心。广州和香港是该区域的主要城市。广九铁路、珠江和在建的广深高速公路是主要交通干线。由于香港的特殊性，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向世界开放方面，珠江三角洲都走在我国的最前列，经济发展已比我国其他地区领先一步。我国两个发展最快的经济特区都在此区内。来自香港的投资强烈刺激了该区的制造业、旅游业和零售业。乡镇企业遍布，吸引大量来自广东其他地区和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的廉价劳工。

上述城镇群不是在三角洲，就是在平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发展历史，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发达。后三个城镇群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中心，首都区和辽南城镇群是我国主要的煤铁生产基地和冶金、机械、石油化工中心。由于这些城镇群位于沿海地区，与世界联系方便，因此改革开放政策促使它们繁荣，已有城镇进一步发展，新的城镇开始涌现，例如，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深圳和珠海，长江三角洲的常州等。

改革开放政策也促使了新城镇群的形成，其中两个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即以青岛为中心的胶东半岛和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外向型经济和地方制造业正在这些地区飞速发展。

闽南——福州和厦门尚没有强大的基础，不能起到增长极的作用。铁路联系仍相当弱，不过，最近建成的高速公路改善了这个城镇群的交通状况。假如台湾和福建之间可以直接进行贸易，这一地区的发展潜力很大。在经济改革以前，该区的工业是落后的。在厦门为经济特区及泉州成为沿海开放城市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当地制造业发展非常迅速。

胶东半岛——以济南和青岛为重点，烟台也是该地区的重要港口。胶济和兰烟铁路是主要交通干线。因为邻近韩国和日本，加上农业、林业和渔业发达，这一城镇群也有较高的发展潜力。

4 全球化所引致的城镇体系发展问题

1978 年以来，开放政策，特别是外资、商品经济和个体企业的引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城镇体系发展产生了许多影响。经济改革使城镇体系迅速变化，外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更加速了该地区城镇增长的过程，使其不得不面临下列紧迫问题。

4.1 暂时人口

由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超出其供给能力，暂时人口随之产生。暂时人口分为两类。一种是暂住人口，与在城市有户口的常住人口不同的是，他们是获准在城市停留一定时间的人口，主要是工厂或建筑工地的合同制工人。另一种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停留几天、几周或更长时间，可以是旅游者、商人或找工作的人。有些城市，暂住人口多达为常住人口的 20—25%。在广州，暂住人口是常住人口的 38%；在深圳，暂住人口比常住人口还多，1991 年，常住人口是 43.2 万，而暂住人口是 76.6 万，后者占官方统计的特区人口的 63.9%。在城市居住一段时间以后，部分暂住人口可能成为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或在收入稳定、福利较好的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或应聘在收入较高的外资企业工作，而暂住

人口的就业行业以建筑业为最多,其次是零售业,尤其是街头的个体零售业。流动人口的存在源自在经济改革的情况下,户籍制的管理不严。非户籍人口可以从自由市场获得其日常必需品,而不必依赖户口。流动人口的现状正在某些大城市敲响警钟,由于各种设施主要依据常住人口而设计,暂时人口的存在给社会设施、交通和住房带来巨大压力,也可能引致城市犯罪率上升。

4.2 城镇土地利用和发展控制

过去,我国城市的内部结构受城市规划和国家投资强烈影响。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个体企业和外国投资介入其中时,他们的重要性日渐削弱。尽管《城市规划法》已在1989年12月颁布实行,但它在控制土地开发方面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它主要要求城市政策要制订总体规划(master plan),但在控制特定地点发展方面,条款订得太笼统,给建设单位和区级政府留下太多自由决策权;现有土地利用区定得过于宽阔,这样,在土地开发的申请者和批准规划许可的机构之间可能发生争执,很难拒绝一项建设申请。发展项目的实际区位、类型和密度可能常常不是规划者在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所希望的那样。

4.3 城市交通拥挤

交通拥挤是现今我国许多城市的共同问题。其中客运交通的状况不断恶化可以归因于不能解决公共和私人交通的矛盾。在我国,从自行车的作用和特点来看,它是一种私人交通工具;而且,自行车在全国都有一定的补贴,已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州,居民出行有32.02%是搭乘机动车,29.95%骑自行车,38.03%步行;其中乘坐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只有21.63%,仅占搭乘机动车的2/3,相当于自行车出行的72%。因此,效率较高的机动车方式要不是未得到充分利用,就是发展不够,而自行车比重过高,在效率、安全、交通规划和管理方面提出了诸多问题,而且,私人摩托车和小汽车等现代私人交通工具正不断扩展,将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由于土地利用的扩展,人们不再是住在工作地附近,通勤人口不断增多。但是,交通系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如道路不足以及交通控制系统和设施的缺乏,难以对付日益增多的行人和车辆。

4.4 环境污染

环境质量的下降是我国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尽管《环境保护法》早在1979年试行,并最终在1989年实行,但它并没有有效执行,特别是在小城市和镇。环境污染在城市比在乡镇得到更好控制,许多农村企业未经任何处理排出废水,空气污染也日益严重。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1978年以来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但这个地区环境污染的威胁不是来自该地区的大城市,而是来自飞速发展的小城市和镇。尽管在80年代前5年广州的人口增加,但珠江下游广州段的水质只表现出非常小的下降趋势,因为广州加强落实环境控制措施,工业废物的排放减少了23%,抵消了同期生活废物的增加。在这五年,广州的工业以12%的年增长率发展,而环境控制措施的落实使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工业废物量减少了16%。在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以外地区,环境控制措施却宽松得多,这是中小城镇吸引工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港澳是珠江三角洲外资的主要来源。随着港澳的环境控制愈来愈严,生产成本愈来愈高,当地的一些污染工业如制革业和印染业逐步迁向珠江三角洲。广州的一些工业企业也

因类似原因搬到农村地区。小城镇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物，产生的问题常超过了当地管理部门处理的能力，这导致许多地区持续不断的污染，使农地的生产力下降，引起氧气衰竭和水体的富营养化及后续污染，降低水产品的产量。

5 结 语

过去的十五年是经济和城镇体系迅速发展的十五年，是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开放政策使其发展得比中西部地区更快，城镇发展和城镇化，特别是农村城镇化，也是以东部地区发展最迅速。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该地区越来越多的镇将上升为新的城市，扭转 1978 年以前在中西部区域分散布置城市的倾向。除非现行政策的重大改变，东部沿海地区新城市层出不穷的现象将不可避免，因为大多数高速增长的小镇均位于这一地区，如广东和江苏。除了新城市的增加，开放政策也有利于东部现有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已有良好的可达性和经济基础，对外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在上海浦东设立特区正是这一倾向的表现之一。假如浦东发展是成功的，它将是其他城市的发展模式之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比内陆城市已从开放政策贯彻实施中得益更多。

全球化对我国城镇体系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相比之下，尽管我国也集中在沿海省份，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分散，没有一个城市或省份拥有全国出口总额或外商投资的 40% 以上。外商投资主要来自亚洲也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巨大差别。

城镇之间对外资的竞争日益增加。竞争发生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不同城镇之间，不同省份之间。为了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有更强的竞争力，许多优惠政策的制定，有时丧失了原则，这已在城镇规划和管理上产生了问题。不过，更重要的是，地方主义的抬头，区域发展缺乏合作。地方主义在发展十分迅速的地区尤其明显。如在珠江三角洲，4 个国际机场分别在珠海、澳门、香港和深圳建设，相互之间相距不过 50km。不象过去，国家为重点基础项目分配资源，现在地方政策能为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但因为缺乏合作协调，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因此，对区域发展和规划应有更好的协调。

出口工业和外资的发展相当部分归功于我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随着劳动力费用和土地价格的提高，与其他亚洲国家，如越南的竞争日渐激烈。为了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性，我国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改善产品质量。为更好地与世界经济构成一体，基础设施较好和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城市应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参 考 文 献

- 1 Chan Kan Wing and Xueqiang Xu.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49: Reconstructing a Baseline. THE CHINA QUARTERLY. 1985, 104: 583-613.
- 2 Chang S D and Kwok R Y.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China, in R. Y. Kwok, W. Parish, and A. G. O. Yeh (eds), CHINESE URBAN REFORM-WHAT MODEL NOW?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140-157.
- 3 《深圳经济特区年鉴》编辑部，《深圳统计年鉴 1991》，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年鉴编辑部，1992。

- 4 Fan, C Cindy. Foreign Trad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2, 24, (3): 240—256.
- 5 Huang X, J Wang, G Cheng, and Z Yang (1988), Water Quality of the Zhujiang River (Guangzhou River Reach) in Early 80's, in P. Hills et. al (eds.). POLLUTION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POLMET 88, 1988, 2: 438—443.
- 6 Jao Y C. and C K Leung (ed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OLI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7 Khan, Zafar Shah. PATTERN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1.
- 8 Kueh Y 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138): 637—690.
- 9 Leung Chi Kin.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1979—1985.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0, 42 (4): 403—421.
- 10 李梦白, 胡新. 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
- 11 Ma Shiaoling and Binhuan Qia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Village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P. Hills et al. (eds.), POLLUTION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POLMET 88, 1988, 1: 125—128.
- 12 Phillips D R and A G O Ye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Impact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in Cannon T and Jenkins A (eds.). THE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IMPACT OF DENGXIAOPING'S DECADE, London: Routledge, 1990: 224—248.
- 13 Shen Tsan-Hsin.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IAN GEOGRAPHER, 1983, 2 (2): 1—10.
- 14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1》. 北京: 国家统计局, 1992.
- 15 国务院. 《城市规划条例》. 北京: 国务院, 1984.
- 16 Xu Xueqiang.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Changes and Causes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SIAN GEOGRAPHER, 1984, 43 (3): 318—335.
- 17 Xu Xueqiang. Trends and Changes of the Urban System in China.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1984, 6 (1): 47—60.
- 18 Xu Xueqiang and Si Ming Li.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990, 14 (1): 49—69.
- 19 姚士谋等. 中国的城镇群.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2.
- 20 Yeh Anthory Gar-on and Xueqiang Xu. Provinci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imacy in Chin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84, 23 (3): 1—20.
- 21 Yeh Anthory Gar-on and Xueqiang Xu. Changes in City Size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1953-86. in R Y Kwok, W Parish, and A G O Yeh (eds.). URBAN REFORM-WHAT MODEL NOW?.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45—61.
- 22 Yeh Anthory Gar-on and Xueqiang Xu. New Cities in City System Development in China 1953-86. ASIAN GEOGRAPHER, 1990, 9 (1): 11—38.
- 23 Yeh A G O, K C Lam, S M Li and K Y Wong.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velopment Issues and Research Agenda. ASIAN GEOGRAPHER, 1989, 8 (1), (2): 1—9.
- 24 Yeung Yue-man and Xu-wei Hu (eds.).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 25 Zou Deci.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from 1980s to 1990s.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1990, 6 (3): 3—16.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THE URBAN SYSTEM IN CHINA

Xu Xueqiang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nthony G. O. Yeh

(Centr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kong)

Zhang Rong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China has expanded her foreign trade, utilized a lot of foreign capital, and therefore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system. Because the coastal region is different in the level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tion and accessibility from the inland region, the former has got more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al region, the existing urban clusters are spreading and new ones are appearing. However, a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traffic jam, sprawl spread in land us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become serious problems in coastal cities.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rban system, Coastal region, Inland region